



从“人文主义”到 “保守主义”

《学衡》中的白璧德

张源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三联 ●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从“人文主义”到
“保守主义”

《学衡》中的白璧德

张 源 著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This Academic Book
is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中的白璧
德/张源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1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978-7-108-03104-4

I. 从… II. 张… III. 白璧德, I. (1864~1933) —人
文科学—研究 IV. 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9244 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 数 258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

•

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科学与
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奖掖新进人材，鼓励刻苦治学，
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
学术创新精神，
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
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
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按年度评审遴选，
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
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

目 录

引 言 《学衡》译文：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在 中国的第一个阐释形态	1
第 I 章 欧文·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思想	20
第一节 白璧德：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奠基人	20
第二节 何为白璧德之“人文 主义”(Humanism)?	44
一 “人文主义”定义简述	46
二 “人文”与“人道”：对立还是统一?	50
第三节 “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概念	53
一 一个核心——“内在制约”(inner check)	55
二 “二元论”(dualism)	57
三 “存在的三个等级”(three orders of being)	60
第四节 白璧德思想中隐含的一个基本问题 ——“人文主义”与宗教的关系	63
一 问题的提出	63
二 白璧德的宗教观	66
三 “人文主义者”内部的论争	78
四 白璧德的“宗教”：“超自然的” versus “超人的”	86

第2章 “人文主义”译入中国:

《学衡》徐震堦译文研究 92

第一节 徐震堦、吴宓与《白璧德释

人文主义》 92

一 引子:译文与原文的出版时间问题 92

二 译文的双重作者:译者徐震堦与

编者吴宓 96

第二节 译文文本研究 105

一 译文“勘误” 105

二 置换·增删·翻译意图 117

第3章 “人文主义”的本土化(中国化):

《学衡》胡先骕译文研究 144

第一节 胡先骕、吴宓与《白璧德

中西人文教育谈》 144

一 引子:译文的“生产”问题 144

二 胡先骕:译文的独立生产者 149

第二节 文化与政治:白璧德人文

教育观的双重面向 163

一 第一重面向:教育与文化观念的关联 165

二 第二重面向:教育与政治理想的关联 171

三 《中西人文教育谈》:白璧德人文

教育观的总结性表述 180

第三节 译文文本研究 192

一 “人文主义”的去政治化:白璧德人文教育观

第二重面向的失落 192

二 归化问题：“人文主义”过度本土化（中国化）	
后产生的接受效果	204
第4章 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	
吴宓译文研究	218
第一节 “为我”还是“为他”？——吴宓译文的	
双重样态	218
第二节 译文中的译者——“复古派”	
还是“古学派”？	225
一 “复古派”吴宓与“礼教”	226
二 “古学派”吴宓与“古学”	235
三 吴宓：两难的身份	245
第三节 走向“保守主义”——吴宓译文中“以理	
制欲”主题之个案研究	256
一 关于“以理制欲”	256
二 “以理制欲”抑或“以‘礼’治欲”？	261
三 “科玄之争”的时代背景	265
四 立足于“我”：五四学人的特有心态	270
结 语 《学衡》中的白璧德：“保守”与	
“自由”之辨	277
一 引子：“学衡派”的“帽子”问题	277
二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279
三 白璧德的自由观	282
四 如何看待“现代”——白璧德与	
柏克的根本歧异	287
五 “保守”与“自由”之辨	291

附 录	附表 1	白璧德著述中译版本列表	299
	附表 2	《学衡》杂志各栏目 译文篇目比例表	300
	附表 3	《学衡》杂志“通论”栏目译介 人物列表	301
	附表 4	《学衡》杂志“述学”栏目译介 人物列表	302
	后 记		303
	参考书目		305
	索 引		318

《学衡》译文：白璧德“人文主义” 思想在中国的第一个阐释形态

20 世纪是中国文化继先秦、魏晋之后第三个重要的转型期。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外来/西方文化不仅承载着为本土文化提供镜像/他者/参照物的职能，而且直接参与了中国 20 世纪初年开始的新文化身份的建设：从最初的“中体西用”假说，经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西/古今之辩，发展到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的中西文化之“体用不二”的现实，西方文化在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渗透与转化的过程，如今早已成为“我”的一部分。^①

“新文化运动”后期，美国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 —

①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发生的关于“失语”问题的讨论，始于“文论失语”（1996 年）而迅速扩散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进而发展为关于“文化失语”的论争，至今未衰——这一现象便很可说明问题。这场论争的实质是，自“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话语汇入本土话语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国文化主体身份之确认的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早在“新文化运动”中便得到了深切的关注，如“东西文化之论争”，“学衡派的反攻”，“科玄之争”与“甲寅派的反动”等等题目均系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不过，如果说当时的论争出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自觉的忧患意识，2000 年前后爆发的这场关于“失语”的讨论本身，则恰恰是彼时知识分子的部分忧虑不可逆地实现之后自发产生的症状之一。——在此我们不拟对“失语”问题本身加以评论，仅希望由此提请大家注意“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生的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于延续至 2000 年前后的文化转型所具有的发生学意义，这正是本书论述的基本进路之一。

1933)的“人文主义”(Humanism)学说^①通过吴宓、胡先骕、梅光迪、徐震堃、张荫麟、梁实秋等中国学人的译介与阐释进入了中国的文化语境,与其他西方观念和思潮一道参与了中国新文化身份的建设,并且通过此后中国本土不断的“重估”工作不断获得新的阐释形态,从而在中国持续至今的文化身份建设的过程中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力。

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说进入中国之后,伴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人们对之产生了多种理解与阐释,这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共四种形态:

一 第一期:“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两种形态

白璧德之“人文主义”学说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在美国本土初为人知,当时已经引起了在哈佛留学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楼光来、张歆海等中国学人的关注与认同;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学说的影响逐渐扩大、进入鼎盛阶段,并开始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其间吴宓等人于1922年1月在中国创办了《学衡》杂志(1922年1月—1933年7月),并围绕该杂志形成了中国20世纪独树一帜的“文化保守主义”流派——“学衡派”,由此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正式通过“学衡派”的译介进入了中国的文化语境,并与中国

① 西方研究者为避免混淆,通常以 humanism 指称广义上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以首字母大写的 Humanism 一词来特指白璧德之“人文主义”,例证所在多有。See Malcolm Cowley, “Humanizing Society”, *The Critique of Humanism*, edited by C.Hartley Grattan, New York: Brewer and Marrow Inc., 1930, p.63. 或直接将其命名为“白璧德那种人文主义”(the Babbitt brand of Humanism), R.P.Blackmur, “Humanism and Symbolic Imagination”, *The Lion and the Honeycomb*, London: Methuen and co.Ltd., 1956, p.148. 或虽小写而仍冠之以白璧德之名,即“白璧德之人文主义”(the humanism of Babbitt), Dom Oliver Grosselin, O.S.B., *The Intuitive Voluntarism of Irving Babbitt — An Anti-Supernaturalistic, Anti-Intellectualistic Philosophy*, ST.Vincent Archabbey, Latrobe, PA., 1951, p.6. 相应地,本书以不加引号的人文主义指代广义上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以加引号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指称白璧德之“人文主义”思想。

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形成了在中国的第一个阐释形态，即“学衡派”所译介/阐释的“白璧德之人文主义”。

《学衡》的译者们对白璧德学说的理解当然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并且随着外部语境的变化，即便是同一位译者，他对于这一学说的解读在这个历时九年的译介过程中亦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不过，《学衡》译者作为白璧德学说在中国的“第一批”阐释者，由于他们具有基本相同的立场与近似的学力背景，对本土文化资源的选择与取用有着大体一致的倾向，特别是他们均采取了共同的语言转换模式，即均以浅近文言作为目的语的基本形态，因而《学衡》这批译文在世人眼中，不免大同而小异。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在人们看来，《学衡》译者对“语言载体”的选择成为左右这一思想命运的决定性因素：需知《学衡》一向是以其“文言”取向见谤于“新文化派”、乃至“新文化派”在新时期之精神后裔的。^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译文之间的差别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它们不再具有“个性”，而是作为“一批”译文从“整体上”对此后的解读发挥着影响。

《学衡》的“拟古”译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读者对白璧德学说的主动接受；不过，稍后便出现了以白话宣传“人文主义”学说的又一健将梁实秋。20年代梁实秋留学美国（1923—1926），并于1924—1925年选修了白璧德的“16世纪以后之文艺批

① 逮至2003年，仍有人对《学衡》的“文言”取向深恶痛绝。如朱寿桐《白璧德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宿命角色》（《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一文颇具代表性，文章认为，《学衡》的“文言主张”使之“始终处在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对立面”，“此一旗帜一展，各派旧式文人、守旧势力即以陈词滥调竞相邀集，从而使得《学衡》客观上成了（至少在新文学家看来）群魔乱舞的诗坛，藏污纳垢的文场”，“在锐不可当的新文学潮流面前……呈现着僵死的灰暗，散发着陈腐的霉味”等等。仅寥寥数语，我们已可看出文章充满了与所谓“学术论文”殊不相称的激情，这一现象颇为有趣。我们固然不必伴随着今日“保守主义”在全球的“复兴”，对此前备受批判的《学衡》转而顶礼膜拜，但亦不必坚持将之“关在十八层地狱”。看来，虽然是“新文化派”，经过一个历史时段，也会有其“遗老遗少”。这个例子再次生动地表明，一种激进主义，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在某个时刻顺利蜕变为保守主义——思想的研究者们对此自当会心。

评”一课，^①在白璧德的影响下，他一改对浪漫主义的热衷，转而成为中国当时宣扬古典主义的巨擘，并且从此一以贯之，再未发生动摇。^②梁氏撰写了大量白话文体的文学批评作品，从第一部文学批评集的第一篇文章《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③开始，便几乎是在“复述”、或大胆“挪用”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文学观（这与白璧德美国学生的做法几乎如出一辙），这种宣传手法比“学衡派”更加隐蔽、同时效果也更为理想。吴宓最早注意到了梁实秋文学观的转变，^④三年之后双方合作出版了《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一书。令人兴味的是，吴宓对梁氏这一时期用“白话文”所作的宣传工作并不排斥，相反还似乎颇为赞赏。^⑤不过我们在此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梁实秋的“白话”宣传策略事实上同样未能改变白璧德学说在当时的命运，那么，看来人所共识的《学衡》在选取“语言载体”方面的“失策”，或许并非这一学说遭到冷遇的决定性因素。

① 按梁氏赴美之前，曾于1923年3月到东南大学参访，据吴宓记载，“适值宓讲授《欧洲文学史》正至卢梭之生活及其著作”（这可是白璧德最心爱的话题之一），结果“梁君本人，连听必课两三日”，并且在返回清华后在《清华周刊》中对东南大学的学风以及吴宓溢美一番，吴宓就此发议论说“此亦与清华1924冬之聘宓往，有关”。《吴宓自编年谱》，吴学昭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42—243页。显然梁氏对吴宓授课内容印象非常之好，这可能与他赴美之后在哈佛选修白璧德讲授的课程有直接的关系。

② 梁氏曾自述“读了他（白璧德）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平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操几为之一扫而空。我开始省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加以重估。我在学生时代写的第一篇批评文字《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随后我写的《文学的纪律》、《文人有行》，以至于较后对于辛克莱《拜金艺术》的评论，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影响我的几本书》，载《雅舍菁华》，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

③ 本文于1926年2月作于纽约，载梁氏第一部文学批评集《浪漫的与古典的》，新月书店1927年。

④ 见吴宓1926年3月29日日记“梁实秋（治华）在《晨报副刊》所作评论新文学一文，似颇受白璧德师之影响”，《吴宓日记》Ⅲ，吴学昭整理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3页。

⑤ 见吴宓所记“对于宣扬白璧德师之学说，尤其在新文学家群中，用白话文作宣传，梁君之功实甚大也”，《吴宓自编年谱》，第243页。

20年代末期,“新人文主义运动”(New Humanist Movement)在美国本土进入了巅峰状态,“人文主义”学说随之得到了最为广泛的认可与传播。但是伴随着1929年经济大衰退,这一运动很快便急转直下,并在30年代跌入低谷,“人文主义”学说亦随之销声匿迹。同时,中国的《学衡》杂志于1933年白璧德去世当年宣告停刊,《大公报·文学副刊》也在1934年1月1日出版第313期后不再由吴宓担任主编,从而失去了又一个宣传白璧德思想的阵地。从此“学衡派”对白璧德学说的推介工作陷于停顿(此后仅有吴宓在清华大学的课堂上不时引述或阐发白璧德的学说),而梁实秋的相关推介工作亦主要止于1934年。^①

梁实秋对白璧德学说的“挪用”构成了其在中国的又一阐释形态(始于1926年,基本止于1934年)。它与第一个阐释形态的生成时段部分迭合,但二者选择了不同的语言载体(一者文言、一者白话)与宣传策略(一者直接译介并以之为批判武器,一者大胆挪用并据之开展批评实践)。从而,在中国文言/白话并存的这个时期,白璧德学说也产生了文言/白话两种并存的阐释形态。

二 第二期:“新时期”以来的两种形态

“学衡派”与梁实秋对白璧德学说的宣传与推介均大致止于上世纪30年代前期,此后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这一学说连同其宣传者在国内长期遭到了非学理意义上的批判,从此正面宣传的声音湮没无闻达数十年之久。1949年梁实秋选择在台湾定居,而“学衡派”

^① 除1923年自费刊印的《冬夜草儿评论》之外,梁氏共出版了五部文学评论集。这五部文集均在不同程度上是白璧德“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的翻版:《浪漫的与古典的》(新月书店1927年)、《文学的纪律》(商务印书馆1928年)、《文艺批评论》(中华书局1934年)、《偏见集》(正中书局1934年),以及三十年后在台湾出版的《文学因缘》(文星书店1964年)。最后一部文集收录了梁氏滞留台湾期间所写的文字,与此前文集内容主旨相近,因此我们说他的推介工作“主要止于1934年”。

中坚则留在了大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说被梁氏带入台湾之后,其阐释与传播工作便分别在大陆与台湾以“花开两朵”的模式继续展开,并随之形成了两种新的阐释形态。

台湾较早重提白璧德的名字及其学说。梁实秋赴台后,曾应邀翻译白璧德名作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卢梭与浪漫主义》,1919)一书第五章“Romantic Morality: The Real”(浪漫主义的道德:其现实层面)^①。1964年梁氏在台北出版了文集《文学因缘》,其中《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②一文是在台湾发表的关于白璧德及其学说的第一篇文章。此后台湾再无人述及这一学说,直至1973年梁氏的门生侯健开始对白璧德学说进行大量的宣传与阐发工作,这一情形始发生了改变。

需要说明的是,第二期的情况要比前一时期更加复杂。这时除了对白璧德学说本身的译介、研究以及据之展开的阐释实践外,还新增了“影响”研究的项目。第一期的阐释形态经过数十年的积淀与消化过程,开始对新一轮的阐释发挥强大的效用。新时期传播主体对白璧德学说的理解与再阐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第一期阐释/阐释者的影响,同时,当新时期的阐释者以研究者的客观姿态、自觉回顾并探究此前传播者对于该学说的阐释、接受、传播诸情况,这些研究本身又构成了白璧德思想阐释与传播工作的一部分,并开始“制造”新一轮的影响。从而,新时期白璧德思想的阐释形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对白璧德思想本身的译介、研究和据之进行的阐释实践;(二)相关“影响”研究,后者实际上构成了本研究课题史的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台湾第一方面工作的代表人物为侯健。侯健发表了《白

① 译文载林以亮(即宋淇)编选的《美国文学批评选》,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1年。

② 原载《人生》第148期,1957年1月1日香港出版,1964年始在台湾出版,距梁实秋1934年在大陆停止相关工作整整三十年。

璧德与其新人文主义》(1973)^①、《白璧德与当代文学批评》(1974)^②等论文,以白话文重译了白璧德“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一文^③,并于1977年与梁实秋合作出版了《关于白璧德大师》^④一书,其中几乎囊括了师徒二人所作的全部相关译介文章。

除译介工作之外,侯健还完全继承了老师梁实秋之宣传工作的特点,即大胆挪用白璧德学说并据之开展批评实践。如其《文学与人生》^⑤与《文学·思想·书》^⑥等书均在此列。不过,这些阐释实践与《关于白璧德大师》等作品相比,影响不是很大,故常为人所忽视。

台湾第二方面工作的开创者亦为侯健,他的研究构成了相关课题史的开端。1974年,侯健发表了《梅光迪、吴宓与〈学衡〉派的思想与主张》^⑦一文,同年12月出版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书,^⑧该书最早系统论述了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白璧德之“人文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作用与影响,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1977年,侯健

① 原载《中央月刊》5卷4期,1973年2月。

② 原载《中央月刊》6卷10期,1974年8月。

③ 该文最早由胡先骕以“文言”译出,题为《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载《学衡》1922年3月第3期。

④ 梁实秋、侯健著,《关于白璧德大师》,台北:巨浪出版社1977年。

⑤ 该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1980年出版。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乃是白璧德最为关注的题目之一,吴宓亦曾在清华大学开设以《文学与人生》为题的文学批评课程(1934—1935),此后同名著作《文学与人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于身后出版。

⑥ 该书由(台北)皇冠文化出版社1978年出版。

⑦ 最初发表于《幼狮文艺》,1974年10月第40卷第4期,此后收录于《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侯健著,台北:中外文学月刊出版社,1974年。

⑧ 侯健后于1980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完成了以Irving Babbitt in China (《欧文·白璧德在中国》)为题的博士论文,收藏在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 at Stony Brook,署名Hou, Chien。该论文是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书的基础上完成的,内容安排与原书基本相同,可见侯健是在有意识地向国外读者介绍白璧德思想在中国在接受情况。

发表了《梅光迪与儒家思想》^①一文，第一个指出梅光迪虽然受到了白璧德的影响，“但也深深影响了老师”，并举出白氏著作中多处变化之轨迹为例来说明问题。侯健之后，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数量逐渐增多，内容亦逐渐深化，我们将在后文加以论说。

台湾的新阐释形态产生于70年代初期，发展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与之相比，大陆之“对应”形态的产生则要晚得多。80年代以后，大陆零星出现了一些相关译介作品：最早苏生曾在1980年第2期《译林》简单介绍过“新人文主义”；1989年文美惠翻译了白璧德“The Critic and American Life”一文^②；1994年罗岗翻译了T.S.艾略特批判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名篇“The Humanism of Irving Babbitt”，并为之撰写了按语。^③进入新千年以后，相关译介纷纷涌现，并在短短数年之中便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至于对这一课题的学理探讨，若以1989年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兼论〈学衡〉杂志》^④一文为起点，则迄今只有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似乎很难与台湾的阐释形态划入同一时期。不过，由于台湾/大陆这两种形态与前一时期均存在着长达数十年的阐释断层（留在大陆的“学衡派”1934年以后便基本终止了推介工作，而梁实秋则在三十年后、即1964年方在台湾重新开始了相关活动），为了叙述的方便，尽管台湾并不存在“新时期”这样一个时代标限，我们仍将二者归入同一时期加以对照、陈说。

大陆与台湾的情况多有不同。首先，大陆至今未见根据白璧德

① 本文原载《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1977年第7辑，转载于《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傅乐诗等著，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年，第259—274页。

② 《批评家和美国生活》，文美惠译，载《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四卷，胡经之、张首映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③ 《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罗岗译，载《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④ 本文1989年12月载于《中国文化》创刊号，次年收录于《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年论文集》，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学说所作的阐释实践工作；其次，大陆相关译介作品在 80 年代以后零星出现，直至新千年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出现之后成规模的译介工作才开展起来，这与台湾译介在前、而研究后至的情况恰好相反。不过，这些并非二者最主要的不同。

先看台湾的情况。梁实秋最先将白璧德学说直接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中来，而侯健此后亦部分继承了梁氏的这种阐释方式，从而这一学说“由初抵中土时的社会与文化论述，逐渐被削弱而沦为批评论述，及至局促台湾一隅时，则演变为学院中的学术论述”^①。问题是，一种学说之所以会“沦为”狭隘的“学术论述”，自与其生存环境密不可分。面对台湾（上世纪 70、80 年代以后）日趋“冷漠”的接受环境，这一“文学批评”理论不得不渐次退守于学院一隅——这与其在美国本土 30 年代的际遇分外相似。当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批判学说“沦为”狭义的文学批评理论之后，便脱离了其产生的背景及其所要对质的命题，由此逐渐失去生命力。当“人文主义”思想在美国借助“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广为传播之时，恰是这一学说遭到曲解、创造力枯竭的时刻。不过，当“新人文主义”作为一种运动“销声匿迹”之后，“人文主义”思想却在新的历史时刻再度焕发出了生机。此为后话，回到主题，我们看到，这一学说“偏安”台湾之后，可能恰恰是由于台湾与大陆“意识形态环境”的隔绝，导致其脱离了大陆复杂而宏大的思想史背景与环境，才会由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批判学说“沦为”狭义的文学批评理论的。

① 李有成，《白璧德与中国》，载《中外文学》，第 12 卷第 3 期，1991 年，第 64 页。作者作为台湾学者，描述的乃是白璧德“人文主义”从“新文化运动”后期进入中国直至“局促台湾一隅”的“旅行”历程（从“学衡派”到梁实秋再到侯健）。彼时大陆新时期的阐释工作刚刚开始，尚未进入作者的视野。不过，在大陆目前的诸多研究中，我们也往往会看到这一学说被视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白璧德也常常被称作“著名文学批评家”或“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大师”等等，这种“误会”实与梁实秋当年的文学批评实践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其直接后果之一。